

# 回顧《大公報》和張季鸞的 文人論政

李金銓

《大公報》是近代中國報業史上「文人論政」的最高峰。《大公報》的成功歸諸吳鼎昌的資金、胡政之的經營和張季鸞的文筆，他們還培養了大批的新聞人才。張季鸞的政論望重朝野，他去世時，蔣介石的唁電奉他為「一代論宗，精誠愛國」，毛澤東也讚揚他為「功在國家」。中共掌權以後，毛還在抱怨剛剛進城的《人民日報》作風散漫，說只要他們能學一點《大公報》他就滿意了。言猶在耳，新政權卻毫不留情地猛烈清算《大公報》那條「封建」的根，以致該報老人如王芸生、徐鑄成乃至蕭乾都曾經紛紛違心地批判《大公報》和張季鸞。幾十年過去了，時代畢竟在變，去年張季鸞的遺體終於獲准魂歸陝西榆林墓園。今年8月16到18日，榆林市並召開「報界宗師張季鸞暨民國新聞史學術研討會」，我應邀在會上做出簡要的口頭報告。本文根據現場錄音訂正而成，以作為《二十一世紀》出版二十五周年的樸素賀禮。

## 一 張季鸞和《大公報》在異時異地所發生的影響

《大公報》和張季鸞在中國大陸的命運極為坎坷，在海外卻發生深遠的影響，且舉數例以說明之。第一例，我從高中開始就抱着浪漫情懷，憧憬記者生涯，1970年考上了台灣中央通訊社，一心想跑外勤，挖掘驚天動地的大新聞。因為我在大學期間得過陳博生先生新聞獎學金，中央社總編輯沈宗琳先生待我如子弟兵。他替台北的五家報紙兼差寫社論，也想訓練我往這方面發展。有一天他突然叫我過去談話，感慨在戒嚴的嚴峻情勢下台灣不可能出現張季鸞，勸我不要跑外勤了，乾脆到中央社的國外部去把英文學好。回想起

\* 感謝瀋陽大學劉憲閣教授惠賜修訂意見。

來，在那個肅殺的年代，年長的黨媒老總肯跟初出茅廬的後進「交心」，實在是格外呵護我了。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寫社論碰到甚麼壓力，內心苦悶必須宣洩。但重點不在於這裏，而在於他的心目中以張季鸞為榜樣。

第二例，上個世紀70到90年代，台灣最好的報紙是《中國時報》，頗有海納百川的氣象。創辦人余紀忠先生是國民黨的開明派，也是政治風向的指標。他心目中的榜樣就是張季鸞，但凡重要的社論必字斟句酌親自定稿。他儼然以國士（甚至國師）自居，認為他的社論是直接和蔣經國對話的。他有時候也會興致勃勃地跟年輕的記者談起張季鸞。



第三例，香港最好的中文報紙當屬《明報》，創辦人查良鏞本來就是出身於已經沉淪的香港《大公報》而後又與之鬧翻的。《大公報》三巨頭張季鸞、胡政之、吳鼎昌早年留學日本，辦報理念原來想學《朝日新聞》，後來慢慢轉向英國的《衛報》（*The Guardian*）。查良鏞每天在《明報》登出兩句話——「意見大可自由，事實不容歪曲」——擲地有聲，就是譯自《衛報》的信條。他每天親自寫社論，心目中必有張季鸞的形象，希望把《明報》辦成當年的《大公報》。曾經在《明報》做過事的林行止，後來出去辦《信報》，也有聲有色，延續了文人論政的香火。俱往矣，這些人物不是故世就是退休，象徵了中國文人辦報傳統的終結。

《大公報》1949年以後屢經改造與整肅，本已奄奄一息，直到文革時期正式宣告死亡。表面上《大公報》已成為歷史名詞，但其精神之頑強往往超出當權者的估計，正猶如風中殘燭，只要碰到死灰就要復燃。1985年《人民日報》海外版四位籌辦者當中即有三位是《大公報》出身的。廈門大學籌辦新聞系，還回去向《大公報》老人徐鑄成和劉季伯取經。《南方周末》創辦時，也曾問道於蕭乾，何嘗不想繼承《大公報》的血脈？何況近二三十年來，更多有志的記者私淑《大公報》和張季鸞為新聞典範。

## 二 《大公報》和張季鸞的歷史意義是甚麼？

《大公報》代表中國士大夫階層向現代知識份子角色轉型的過程。1905年清廷廢除科舉以後，知識人的角色愈來愈邊緣化，而報刊是知識人重新進入政治舞台的一個重要途徑，最好的代表就是梁啟超。張季鸞和梁啟超筆鋒都帶有感情，兩人都接受日本明治維新時期所轉介的西方自由思想。梁啟超參政失敗以後從事論政，張季鸞則自認為是一個職業報人，他在專業化的轉型

中比梁啟超走得更遠。梁啟超的《新民叢報》為了啟蒙，以評論為主；而張季鸞的《大公報》除了評論還有新聞，而且他的評論是站在平等立場說話，不是居高臨下的口吻。

《大公報》從「儒家自由主義」（或有自由傾向的儒家社群主義）慢慢結合西方的自由主義，前者為體，後者為用。我以為張季鸞的本體思想還是儒家自由主義，他經常講到「良心」和「氣節」，還提倡「報恩主義」，便是明證。但他是有國士之風的職業報人，對自由主義的肯定，也走得比梁啟超更深遠。梁啟超原來是宣揚自由民主的，等到1903年遊歷新大陸歸來以後，對於美國許多現狀感到失望，便力言中國國情不適合實行民主，轉而提倡開明專制。張季鸞不是沒有想過開明專制，尤其1937年前後他對軍人主政不滿，表示「實逼處此」，無可奈何。但終其一生，在抗戰最艱苦奮鬥的時期即使主張「國家中心主義」，他對自由主義的理想也沒有動搖過。1939年5月5日，香港《大公報》刊出〈抗戰與報人〉中的這段話說得淋漓盡致：

中國報人本來以英美式的自由主義為理想，是自由職業者的一門。其信仰是言論自由，而職業獨立。對政治，貴敢言，對新聞，貴爭快，從消極的說，是反統制反干涉。……人不隸黨，報不求人，獨立經營，久成習性。

論及張季鸞與《大公報》的歷史意義，還必須跟當時的報紙比較，從而探討《大公報》如何脫穎而出。林語堂在《中國新聞輿論史》（*A History of the Press and Public Opinion in China*）罵《申報》編得很濫，諷刺《新聞報》簡直沒編，而讚揚《大公報》是辦給那些「教育程度過高（overeducated）的人」看的。這句話畫龍點睛，表明《大公報》的讀者都是高層知識人。《大公報》開辦時充其量是張天津小報，卻有全國性的格局與氣度。《申報》和《新聞報》的目光反而始終局促在上海十里洋場，沒有雄心要引領全國輿論。從商業經營和資本上看，《大公報》遠遠不是《申報》和《新聞報》的對手。在抗戰以前《大公報》不過是50萬元的小公司，而《申報》的總資產達到了300萬元，它每年的盈餘50到60萬元，就高於《大公報》的總資產了。胡適曾說《大公報》這「小老弟」趕過了《申報》和《新聞報》，是全國最好的報紙。

范仲淹所說的「以天下為己任」，正是中國儒家士大夫知識人的精神特質，西方的專業人士才不會把天下的責任扛在自己的肩膀上。所謂「文人論政」，文人就是文化人，民國時期的職業分工沒有那麼細，文人、報人、學者都是跨界的。中國報人無不自許是知識人；像胡適這樣的知識人在報刊上寫文章、辦政論雜誌，而許多報人也到學校教書，職業角色並不是涇渭分明。陶希聖讚揚張季鸞是魯仲連式的人物，除了與蔣介石交好，還能夠周旋於各方，特別是英美歸來的自由派知識群體，而同樣在天津的《益世報》就做不到這一點。張季鸞有一流的文筆和手腕，胡政之更是徐鑄成眼中僅見的辦報全才，會寫，還會經營。

### 三 《大公報》和張季鸞的時代精神是甚麼？

八九十年過去了，為甚麼我們還在懷念《大公報》和張季鸞呢？因為這是文人論政的最高峰。張季鸞追求新聞自由，又不為政治所俘虜，這在中國報刊史上是絕無僅有的，很多報紙都巴望受到政治勢力的青睞。《大公報》有這種不為政治服務和不受金錢腐蝕的自覺，正是源於儒家重義輕財的道德理念。報業經營當然必須站住腳，《大公報》拒絕接受政治津貼，決定拿出5萬元來辦，辦不了就關門；由於胡政之善於經營，《大公報》的財務狀況並不差，卻不想賺太多錢，怕受到金錢的污染，這在中國的報刊史上是可以大書特書的。在某個意義上說，這個理念和當今德國學者哈貝馬斯（Jürgen Habermas）所說的「公共領域」可謂異曲同工，前後輝映，但那是另外的話題了。

《大公報》和張季鸞以「不求權，不求財，不求名」自勉，不求權力和錢財已經很難，「不求名」更難，因為實至名歸，不求自來。《論語》開宗明義說「人不知而不慍」，又說「不患人之不己知」，《大公報》提出「不求名」是為了「公心」，更是具有明顯的儒家印記。

《大公報》和張季鸞所留下最寶貴的精神遺產是新聞工作的「四不原則」：「不黨、不賣、不私、不盲」。這個「四不」原則是1931年5月22日在〈大公報一萬號紀念辭〉的社論提出的，絲毫不因為時間的沖刷而失去意義。關於「四不」，闡釋者已多，我不再詞費。但必須指出，在精神境界上，這個「四不」原則與西方的「媒介專業主義」互相發明，接近之，甚至超越之，至於是否落實到具體操作層面形成規範或建立傳統則是另外一回事。

《大公報》的「四不」原則和西方媒介專業主義的社會動力畢竟不一樣。以美國歷史為例，有兩股力量塑造媒介專業規範，一是1830年以後市場經濟開始勃興，中產階級抬頭，報刊為了爭取更大量讀者，放棄黨同伐異的習慣，以至於新聞記事強調客觀公正與不偏不倚，逐漸與評論意見剝離或分途；二是脫胎於上個世紀初期的「進步運動」，它對政治、經濟、文化都有深刻的影響，更是鼓勵了媒介揭發官商惡行，號稱「扒糞運動」。當今許多學者都普遍認識到：專業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興起息息相關，但是資本主義發展過頭則會侵蝕專業主義。

反觀1930年代中國資本主義根本不發達，《大公報》卻對資本市場已有戒心，聲稱辦報需要有錢，但不能太有錢，深怕太有錢的股東會影響言論自由。《大公報》「四不」原則的社會源頭不是資本主義，它反覆強調的道德基礎是知識人的「良心」和「公心」。張季鸞追求言論獨立自由，思想上受到西方影響絕無疑義，但他的基本道德理念還是建立於儒家自由主義的輕財重義。不僅張季鸞如此，同時代的人也類同，成舍我1935年在上海辦《立報》，也說過「憑良心說話」，這是那一代傑出報人的普遍心態。

張季鸞和《大公報》在專業主義方面做了些甚麼？報人徐鑄成經歷文革劫後餘生，年屆七十歲時始寫回憶錄，說夢見自己寫了一篇好社論，受到張季

鸞和胡政之的褒揚，可見張季鸞對下一代報人的影響有多大。張季鸞邀請胡適等200多位從美英歸國的自由派學人撰寫「星期論文」，共發表了750篇，形成意見領袖，對於國民政府和整個知識界影響巨大。張季鸞重視新聞教育和新聞專業組織，不但參與平津新聞學會並起草宣言，也參與創建中國新聞學會，對燕京大學新聞系的貢獻尤多。他本人並不同情共產主義，但還是願意報導共產黨的活動，也是專業精神的體現。

#### 四 《大公報》和張季鸞的內在限制是甚麼？

美國政治社會史家穆爾(Barrington Moore)有一個著名的論斷：沒有資產階級，就沒有民主。如果這個論斷正確的話，那麼中國從來沒有出現資產階級，零星的資產份子不構成階級，以致生產力落後，社會矛盾無法調和；《大公報》縱使做了最大的努力，還是不能夠達到爭取中國自由民主的境界。何況中國自由知識界脆弱，幾乎以反對國民黨為共同綱領，而面對共產主義時很少立場不動搖的。這是整個中國的問題，不能單獨苛責於《大公報》。

《大公報》和自由派知識份子關係密切，這是很了不起的事，但也無形中和草根民眾的聲音脫節了。鑒於中國經濟貧窮，教育愚昧，交通閉塞，《大公報》所能影響的只是都市知識份子和中產階級，是點的，是線的，而非面的。該報有此自覺，曾經批評中國報業太注重政治，只顧着都市，而放棄了佔人口總數90%多的農民。因此該報派記者巡迴採訪，發動了近二十次的賑災活動，但以其薄力和國情，畢竟不能布置很細緻的新聞網。《大公報》頭版有一半是該報記者採寫的，而不是用通訊社的稿件，這在當時全國也是絕無僅有的。

《大公報》因戰爭原因搬遷了很多次，除了抗戰時期進入內地(武漢、重慶和桂林)以外，主要還是以租界(天津、上海)和殖民地(香港)為據點。在租界辦報，有些話才可以講，但其道德意義畢竟不同。1941年《大公報》獲得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頒發榮譽獎章，《大公報》重慶版發表了一篇社論，懇切地表明他們在後方或海外辦報儘管艱難，卻遠不如上海和其他淪陷區的同業那麼勇敢。

#### 五 今天看《大公報》和張季鸞的意義何在？

《大公報》的「大公」精神傳統何以中斷了？今天中國新聞獨立自由遭受兩面威脅，一是政治，二是經濟。1949年之後，大陸和台灣選擇了不同的道路：大陸嚴厲的政治控制從來沒有鬆懈過，新聞只是政治的奴婢，然而即使備受打壓，《大公報》的魂魄只要一息尚存，卻不時要跳出來起點作用；台灣



在報禁結束以後，政府控制的力量撤退，新聞界心情舒暢，但族群撕裂和市場邏輯已經開始腐蝕新聞自由和專業主義，令人不勝唏噓。香港的新聞自由原來在夾縫中求生存求發展，現在無論從紐約自由之家 (Freedom House) 的評分、巴黎無國界記者 (Reporters sans frontières) 組織的評分、香港大學的民意調查，以及香港中文大學對記者所做的調查，無一不顯示香港新聞自由的前途堪憂。撫今追昔，更加令人體會到《大公報》的「不黨、不賣、不私、不盲」歷久彌新，對兩岸三地都有極為深刻的現實意義，值得嚴肅地探討，共同賦予時代新解。

今天的媒介生態跟幾十年前完全不一樣了，再過幾十年報紙的面目如何都未可知，但新聞卻是永遠存在的。而且，面對全球資本集中和壟斷的情勢，如何保持言論獨立，良心泰然？這是我們所必須思考的，也是紀念張季鸞和《大公報》的意義所在。

《大公報》的讀者是高層知識人，但文人論政的時代已經過去了，新聞專業化是不可逆轉的道路。社會愈來愈複雜，分工愈來愈仔細。但西方學界也普遍認識到媒介專業主義的許多局限性。如何在職業分工的同時，保持儒家優秀的精神素質——以天下為己任，言論獨立，良心泰然？同時，在今天的公共領域裏，知識人不再是特殊階層；他們必須站在公民的立場，憑藉知識基礎對公共事務發表意見，但不再高人一等了。面對新時代的挑戰時，新聞人如何創造與維護公共領域？新聞人如何以「不黨、不賣、不私、不盲」為張本，重新思考他們應有的角色、權利與責任？

## 六 新聞自由宣言

台灣從1987年7月15日起解除戒嚴，《新新聞》周刊先聲奪人，於3月12日應運創刊。我應邀為該刊的發刊詞寫下了以下期許的話：

新聞自由的目的是在於追求真相。新聞自由不止是報業經營者的自由，也是新聞專業工作者的自由，更是社會全民的自由。全民有知道真相的權利，全民有免於被蒙蔽真相的權利，全民有不被歪曲形象的權利，全民有免於恐懼、暢所欲言的權利。自由報業接受公共信託，必須全力以赴，追求真相。自由報業以公是公非為依歸，要永遠站在人民的立場講話。自由報業必須接受社會力量的監督。

這幾句話呼應本文開端所表達的意思，權充相隔數代的無名晚輩對《大公報》和張季鸞先生的禮讚。

**李金銓** 香港城市大學媒體與傳播系講座教授，傳播研究中心主任。